引言　非凡的优异

诺贝尔奖章上所刻绘着的，是人性的脆弱。

诺贝尔奖章上所刻绘着的，是人性的脆弱。那些甄选获奖人的,那些接受诺贝尔奖的,都不过是凡夫俗子。可是正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浮夸盛行、商业至上的社会中,许多人喜欢崇拜那些标榜崇高情操和高尚理想的个人和机构。涵盖物理学、化学、医学、文学、和平等领域的诺贝尔奖,就广泛地被认为是这样一个机构。天才、优异经常与诺贝尔奖连在一起,特别是诺贝尔科学奖。专有权和杰出的成就，界定了获奖人的地位。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豪华而几近神秘的授奖典礼，在一个平民化庸俗的时代常被视为是高尚品位的顶峰——典雅、庄严而高尚。多数人不会相信这个奖可能不代表大家公认的卓越成就。愤世嫉俗者以为这个奖所代表的不过是自私和阴谋。这两种立场都不准确,尽管在诺贝尔奖头一个 100 年中,这两种立场的共鸣都可以看到。

优异的成就可能牵涉到权谋政治吗？这是多么奇怪的想法。优异的成就,特别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肯定是清楚而可辨识的。主观的意见、趣味和政治也许能影响诺贝尔文学奖与诺贝尔和平奖,可是科学—— 穿着中立和客观的外衣—— 难道不是非常清楚而严格，在选择最佳上应该超越所有这些不相干的事情吗 ?可是,我们可能也都会同意,凡是奖都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是一种支配形式,既有明智的判断也免不了打上私利、权谋的烙印。但是对于诺贝尔奖,我们大致上都愿意相信,非凡的优异似乎是通过一个完美无瑕的程序选出，不受任何偏好或偏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玷污。

1 诺贝尔奖和它的历史

在谈到这些问题和本书的主题之前，让我们略为回顾一下构成这段历史的一些事实和视角。

首先，一些贯串本书的具体细节：诺贝尔奖候选人的提名权仅限于特别指定的人。这些人可分成两类：有永久提名权的，和每年特别甄选的。有永久提名权的，包括瑞典皇家科学院（以下一般简称为皇科院）的瑞典籍院士和外籍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不一定是皇科院的院士）、从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或化学奖的获奖人，及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和挪威）1900 年以前成立的大学中的物理教授和化学教授们。每年甄选的，则由委员会每年要求皇科院邀请至少 6 所国外大学的物理学和化学讲席教授，和不定数目的科学家提名。

提名必须在每年 2 月 1 日以前收到。各项奖提名由 5 人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作出评审，准备一份讨论各位候选人相对优点的报告，然后向皇科院提出建议，通常在初秋完成。皇科院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投票，同意委员会的建议，或者提出他们自己的建议。最后，皇科院全体投票。在诺贝尔奖的前半个世纪，各委员会在 9 月投票，皇科院在 11 月中旬投票；后来这些日期都往前移了 1 个月。

委员会的组成肯定是关键的 判断、偏好和利益都不免会介入委员会的工作。

生理学／医学奖的运作大同小异。坐落在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医学院及其诺贝尔委员会负责这个奖。足够的迹象显示，那些涉及医学奖的人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与物理学奖和化学奖上是大致相同的。委员会的组成肯定是关键的；判断、偏好和利益都不免会介入委员会的工作。在对几位都有得奖资格的候选人作选择时，并没有一个明晰而公正的标准可循。卡罗林医学院在 1950 年所面临的一个极端混乱的情况，可以说明其困难的程度。它也许可作为一个象征，所有的诺贝尔委员会都面临着困难

的选择：1950 年，生理学／医学奖委员会在四轮投票之后仍然不能达成决议。虽然产生了 3 个主要候选人，可是在进入决定性的会议时，结局仍然在未定之天。当一位委员会的成员恳求另一位同事来开会时，他联想到最近发生在英国议会中的一个戏剧性的情况：要是某个人感冒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将会出现[1]。

瑞典科学家们在甄选获奖人和这个程序的形成上，有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在各个诺贝尔委员会上的职位，实际上保证了这个历程。了解委员会成员们在科学上的取向和优先，了解他们的专业训练、对外的接触和野心，对理解授奖的决定至关重要。委员们认为什么重要，就影响到物理学和化学中何种专业应该受到考虑；何种特定的工作应该予以授奖。

这整个事业的基础和这段历史的起点，自然就是诺贝尔（Alfred Nobel）的遗嘱。诺贝尔的遗嘱在 1897 年公布，当时它是一个谜。瑞典政府在 1900 年批准了诺贝尔奖的规章时，这些管理诺贝尔的财产和运作诺贝尔奖机构法律上的指导方针并没有解决所有原来的疑惑，其他较不显著的疑点随时间推移才出现。任何严肃的诺贝尔奖授奖史，必须包括对规章的解释与调和不同意见的历史。

委员们在评审谁和什么样的成就应该得诺贝尔奖时，他们实际上在干什么？他们在作公正判断时能不能排除一切的顾虑和偏见？这些问题的答案从“肯定不”到“也许”，甚至一个有条件的“是”。要了解他们的行动，仅仅将委员们的科学趣味和智性上的爱好与候选人的成就作对比是不够的。要了解他们可能的动机、利益和偏见，及它们在这个程序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必须拓宽视野。科学世界不仅是一个思想和人物的世界，它也需要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对科学和对瑞典有一定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将本书所讨论的这段历史整理出一个头绪。

委员们在评审谁和什么样的成就应该得诺贝尔奖时，他们实际上在干什么？

2 作为一种建制的科学

杰出的思想和对知识的渴求，在推进科学上是很重要的。

可是科学并不单纯因为个体希望了解自然的奥秘而发达。很多人热衷于个人天才的崇拜，然而科学却需要一个共同体，或者许多的共同体。承认这个事实，并不减低个人成就的重要性。首先,我们不能把‘科学’看作一个单独的实体,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在科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中有许多分支。

从过去 200 年的科学史(history of the sciences),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将广大的自然现象领域分割成许多专业范围。由与有生命自然和无生命自然相关的广泛的、一般的研究，产生了诸如物理学、化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等学科。到 1900 年，因为巨量的知识和掌握复杂研究方法的需要，许多这样的学科又被分成诸多子学科。有时候专业之间的沟通能提供新的方法来解决老问题；有时候专家们将他们自己锁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不与外界交往。科学学科的版图变化及其细分的产生和成长,并不是‘自然’的 它们之间的界线、标准和优先,常因为不同的意见和争执而产生。

一个学科有一个学科的纪律。一个有生机的科学领域必须有方法来组织资源,认证知识,方便交流,吸引新的从业者,取得群众的支持和市场。如何决定某个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哪一种研究方法最可靠？什么样的成就最值得表扬？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大多数科学家的日常工作上并不成为问题，可是它们却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它们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权威和权力也是推进科学所不可少的。各种竞争，为了资源、计划之制定、作出新发现和得奖而角逐，当然都是现代科学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权威和权力也是推进科学所不可少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如果一个研究者想要为自己建立名声、招门生、立门派、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向,他越来越需要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在行动上，像一个企业家。她或他凭见识和直觉可以找出既可满足好奇，又能得到资助和声望的研究项目。他们寻求赞助人，他们拉拢科学界和社会上的顾客们来使用他们的研究，雇用他们的门徒。20 世纪的科学牵涉到越来越大的机构，吸纳越来越多的金钱。现代科学就像军队一样，粮草先行。有时候是有意的，有时候是无意的，诺贝尔奖为被选中的少数人

提供了声望、权威和现金。

将凶狠的竞争乃至阴谋的严酷世界与诺贝尔奖的高尚形象放在一起，可能会令人难以置信，甚至令人生气。难道诺贝尔奖的历史会将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中的这两个极端凑到一起吗？也许，我们需要了解某一个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在不同时期中的各种行为、价值和态度。由于他们的研究方法，科学家们通常是很理性的，可是他们也常常为情感所驱使。追求真理，并不是他们日常工作中唯一的推动力。正如一位委员会的成员所说，不论好歹，科学家们并非永远是上帝最完美的创作[2]；他们的判断和决定也会带有卑下的动机。事实上，傲慢和谦逊，固执和妥协，自私和慷慨都交织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中。授奖的人所考虑的利害关系是什么，他们对诺贝尔奖图谋什么？诺贝尔奖所表彰的究竟是什么？

诺贝尔奖的历史，就是利用诺贝尔奖的历史。从诺贝尔遗嘱公布的那一刻起，那些在对它的解释和履行上可能有影响力的人，就看到向某些目标推进的机会。随后的历史表明，那些与提名和评审有关的人，逐渐学会了怎样利用诺贝尔奖作为文化和科学活动的一个重要资源而开掘其价值。与时俱增的是，这些目的常常仅是为了狭隘的职业上的利益。可是，诺贝尔将他的奖与“对人类的福祉作出最大贡献者”相连。他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其他的人又如何解释它呢？

诺贝尔奖的历史，就是利用诺贝尔奖的历史。

3 访问外国：一个介绍

诺贝尔奖的授奖史，将会把读者带到不熟悉的地方去。那些履行诺贝尔遗嘱和授奖的都是瑞典人；要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我们需要对他们的环境有所了解。多数人对于瑞典，特别是瑞典的过去知之甚少。虽然重要的历史片段在需要时会被介绍，开篇一个简要的介绍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正文。

瑞典在 1900 年左右是一个位处欧洲北部边缘的小国。她的人口只有 500 万，比起法国的 4000 万和英国的 3500 万要少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多。首都斯德哥尔摩东临波罗的海，人口大约 40 万。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过去一度是个大国。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早期，波罗的海是一个瑞典海。在尚武的国王们的领导下，瑞典征服了部分现在的德国、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俄罗斯。芬兰属于瑞典，甚至在国王查理十二(Charles XII)在 1700 年代初期的惨败之后。一个世纪后，瑞典失芬兰于俄国，可是挪威仍然是瑞典王冠之下的一个附庸国。多数挪威人不接受这个安排，当两个国家都陷入一连串的经济困难后，这种联姻关系就变得更紧张了。大批往美国的移民，深深地影响了两国人民的心理。在 18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两国间的联盟开始破裂。挪威人在内政和外交上要求更大的自主权，并逐渐要求完全的自治权。 1890 年代中期的一些危机引起人们的恐惧，这个联盟只能靠瑞典的军事干预才能维持。在经过不懈的外交努力之后，这个联盟终于在 1905 年和平地结束了。

1900 年左右，其他重大改变冲击着瑞典社会。在某些方面跟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一样，瑞典很勉强地进入了现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农庄主和贵族阶级继续统治着瑞典。经过一个快速而较迟的工业化后，重工业却只占整个经济的较小部分。在战前数十年中，多数国家的中产阶级民主运动和逐渐引起骚动的工人运动都还没有凝聚成统治力量。对传统的统治阶级和皇室来说，这个新世纪的新社会秩序究竟将是无约束的工业资本主义，还是激进的社会主义，是很难说的。他们对两者都没有特别的好感。暂时的、因势而变的联盟，安抚和中立化有骚扰性的社会群体，可以将国家的不稳定维持在最低限度。在这个时期，国家仪典的传统在整个欧洲有飞速的成长[3]——从皇家庆典到纪念碑、歌曲和节日——其目的不外是将对祖国、社会阶层的认同和忠诚灌输到人民心中。我们将看到，瑞典也不例外。

当然，每个国家的发展和他们解决改变所带来的问题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从 1870 年代开始，变化的速度逐渐加快，直到 1900 年左右，瑞典社会被一个较迟而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时代。保守的保皇派国家主义在这段时间中作了最后一次的绽放，同时我们也看到政治和文化的自由主义

开始萌生。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富有的工业和商业上的领袖们进入了上流社会，可是作为一个阶级，这些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必须克服暴发户的社会污名，争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这个阶层的努力和成就，显然将瑞典推进了一个走向国家复兴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常被称为奥斯卡时代，因为奥斯卡二世（Oscar II）从 1872 年到 1907 年是瑞典国王。这个时代的文化、关怀和价值观决定了人们对诺贝尔遗嘱的态度，决定了诺贝尔奖作为一个瑞典机构的形式。

在民主改革上，瑞典比许多欧洲国家滞后。在 1900 年，有投票权的瑞典人仅占全国人口 6%。瑞典议会（Riksdagen）的所谓上院，由贵族和具有长期皇室服侍经历的官僚家族保守派所掌控。原则上比较民主的下院则由富有的农庄主所掌控，他们在 19 世纪中叶才取得投票权。到了 1890 年代，一个包括工业和金融资本家、专业人士、知识分子等的自由党要求所有男人都有投票权，要求自由贸易和削减军费。另一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则代表快速增多的产业工人。他们的目的是较快而剧烈的政治改革，并与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反对君主制度。当时的观察家注意到，城市和以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在加速成长，而社会的分化也在增加。

虽然议会的两院只代表社会中极小的一部分，可是扩张很快的大众媒体如日报、周刊和其他期刊却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国事论坛。在 1880 和 1890 年代中，报纸的数量和它们的销售量都呈大幅度增长。媒体对诺贝尔遗嘱的落实和在国内外取得成功上，都有相当的功劳。

瑞典在政治上一直保持中立，可是在文化上和智性上当时是与德国连结在一起的。学童们都学德文，学者们与德国大学有密切的关系。瑞典的学术文化完全是德国式的。大学中的学系（名为学院）被一位教授专制地统治着，他对他的学科的界定和控制有绝对的权威。两国间无论是在既有的官方政治文化上，还是在较新的文学、艺术运动上，都有密切的交流。1909 年瑞典南部特雷勒堡（Trelleborg）与普鲁士的萨斯尼茨（Sassnitz）之间的火车轮渡开通了，将斯德哥尔摩和柏林之间已经很短的旅

瑞典的学术文化完全是德国式的。

程减到仅仅一天。两国间的亲密不止是交通上的便捷。在1800年代后期，各式各样受达尔文学说影响的理论进入受过教育的人们心中，瑞典人和德国人——北欧和条顿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种族渊源[4]。

诺贝尔奖机构的基础

在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前半个世纪，3个机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瑞典皇家科学院，它是正式的颁奖者，是委员会的成员的遴选者；乌普萨拉大学，皇科院中大多数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在那儿受过教育，许多委员会的成员在那儿当教授；斯德哥尔摩高等学院（后来的大学），它是有意按与乌普萨拉传统对立而建立的，许多委员会的成员在那里任教。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机构的一些机构特性和文化特点。它们不仅是历史舞台上的背景，而且是影响这场诺贝尔奖大戏如何开幕的重要因素。

它们不仅是历史舞台上的背景，而且是影响这场诺贝尔奖大戏如何开幕的重要因素。

皇科院在1739年成立，其目的在于增进瑞典的民智。它的6位创始人包括科学家和政治家，他们想以实用科学（practical science）来获得瑞典未来的富足。他们模仿伦敦的皇家学会，取得了皇家的特许状，那虽然给了他们声望，可是钱很少。他们选择了一个植树的老人为徽章，上边的“富足”字样标志着他们的目的。虽然皇科院最初致力于实用方面，如合理的种植方法和商业，它却包括了几位国际知名的研究者，如摄尔西乌斯（Anders Celsius）、林内乌斯（Carl Linnaeus）和谢勒（Carl Scheele）。在一段低沉期后，1818年皇科院开始了一个有作为的新时期。它选出了一位意志坚强、国际知名的化学家贝尔塞柳斯（Jacob Berzelius）作常务秘书长。他加强了与国外重要科学中心的接触，重组了皇科院内部的结构，反映了大学中新兴的科学专业分类。

可是跟其他国立学院一样，皇科院毕竟与大学不同。大学自中世纪时期以来主要是为了训练文职人员：教士、律师、医生和教师。研究仅在1800年代才逐渐进入大学，原创研究在1900年代才被广泛地规定为教授职责的一部分。成立于166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和成立于1666年的巴黎科学院的渊源是复杂

的，可是它们和瑞典皇科院都是以实用的科学研究来为国家服务，并通过院士们的成就为国王和国家带来荣誉。

在诺贝尔事业开始时，实用和描述性的科学在皇科院仍然占着重要的地位。它的 100 名院士被选人 9 个小组。物理学组有 6 名成员；动物学和植物学组有 16 名。19 世纪下半叶皇科院最重要的成就[5]，是在为国家和英雄式探险的成就上所作的服务。例如，皇科院负责组织了有名的瑞典北极研究，包括诺登舍尔德（Adolf Erik Nordenskold）的东北航路的航行（1878—1880 年），为瑞典人带来国际上的光荣。物理学和化学都不特别突出；自然史博物馆是皇科院活动中历史最长、最受尊敬的一部分。皇科院的名声也来自它的许多服务，包括度量衡制度的统一，时间和时间信号的标准化，以及气象局的成立。

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人们很关心奖章、勋位和其他势利的装饰，皇科院院士的资格拥有科学上和社会上受尊重的地位。皇科院有一种俱乐部式的亲密而排他的气氛。友谊和竞争常会导致一个裂变的机构，可是权威是一个强有力的凝聚力。官方的权威，无论是教授还是皇科院的高级官员，加上资历，通常都能决定谁的话算数。一个刚出道的年轻科学家抱怨，皇科院对官方权威、头衔和地位的注重，远超过对活跃的研究所带来的专业知识[6]。当然，在他得到一个高职位后，他也很高兴地炫耀他自己的权威。皇科院从不同背景的学术机构中吸收他们的院士；有时候皇科院本身的文化也无法缓和冲突与敌意。

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人们很关心奖章、勋位和其他势利的装饰……

成立于 1477 年的乌普萨拉大学，是瑞典的最高学府。这个小镇坐落于斯德哥尔摩北边，约一小时的火车距离，乌普萨拉大教堂和大学主宰了整个小镇的生活。一直以来，这两个城市的时尚和性格上的距离似乎比实际上远得多。与德国的偏僻大学小镇一样，学生和教授们创建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内向地专注于学术生活，沉浸于他们自己的特权和优越感。乌普萨拉的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为政府训练文职人员。而哲学院（文理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为其他学院提供专业性的训练，并且培养中学教师。一些教授在尽其教学、考查职责的同时也做研究。可是如同大多数欧洲和美国大学，教学第一。大约从 1880 年开始，

许多教授希望将研究看作其正常工作的一部分，并且希望得到研究补助。可是朝这个方向的进展很慢。

乌普萨拉的教授们认为在他们的专业上他们是瑞典的权威。在一个被认为比德国人更德国的学术文化中，科学教授很少；每一个学系皆被一位资深的教授专制地控制着[7]。他们常自视为学术社会阶层中的顶尖。一位有机会观察瑞典学术文化的外国学者，觉得乌普萨拉在许多方面都像欧洲小镇上的大学："这里的生活死气沉沉……教授们过着与世隔离的中世纪般的生活，不利于新的、有成果思想的发展。于是一种同志情谊出现了……一个教授拖着下一个（下一代的）教授走。"[8] 一位化学家将乌普萨拉的教授们比作教皇："他们要求人们对他们尊敬，而且期盼这种尊敬，可是不敢走出他们狭窄的专业一步，害怕会显出犯错的可能性[9]。在乌普萨拉大学礼堂大门上于 1887 年刻了这么一句话："自由思考固然伟大，正确思考更为伟大。"对于一所以训练忠诚于国王、国家和教会的专业文职人员为任务的大学，这句话也许很合适，可是它也标志着许多乌普萨拉教授的心态。诺贝尔委员会中来自乌普萨拉的委员们具有这种偏执于"正确"思想的特性，在审查物理学和化学时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到诺贝尔奖。

诺贝尔委员会中来自乌普萨拉的委员们具有这种偏执于"正确"思想的特性，在审查物理学和化学时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到诺贝尔奖。

斯德哥尔摩高等学院(后来变成了斯德哥尔摩大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类型非常不同的机构。成立于 1878 年，由私人资金支持，大学代表斯德哥尔摩的商业和文化领袖们的期望，在较老的乌普萨拉和隆德大学之外为学术界提供一个选择。批评者认为这些老学校，特别是乌普萨拉，拘泥于规章和传统，只顾训练职业性的文职人员，而疏于回应城市中产阶级的文化和实用的关切。许多人对乌普萨拉保守的政治、神学和智性气氛感到失望。学生们通常除了想混过死板的课程，通过政府制定的考试和找个政府职位之外，别无其他更大的抱负。伴着富有色彩的学院传统，学生的生活沉浸在酗酒和粗野的喧闹中。

斯德哥尔摩高等学院所效法的是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和伦敦的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这里的风格是智性上的好奇而不是学位的追求。这所学校拒用官方大学的头衔

中的拉丁文，避免繁文缛节的古老学院传统。教授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讲课的题材,研究工作有较重要的地位,学校鼓励他们与城里的商业和文化精英们接触。进取的社会团体认为自然科学——它的方法、发现和精神——是抗御神学和社会政治上的反动教条的武器；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盟友。最先受聘者中有许多是科学家。不幸到了 1890 年代,内部的冲突发生,而媒体趁机大加渲染。这些不和，使赞助者却步。在 1900 年,这所又小又穷的大学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它只能租办公室，梦想着扩充其少得可怜的教职员和实验室设备。

从一开始，国际眼光和不为传统所拘束的治学态度就被深深地植入高等学院的校风。数学家米塔－列夫勒（Gösta Mittag-Leffler）,首批教授之一,比他的许多同事在社会上更保守,从海外聘请了很有天赋的数学家科瓦列夫斯基（Sonja Kowalevski）。她则成为欧洲的第一位女教授。相反，皇科院拒绝接受她为院士,原因是它的规章上仅指定‘男人’(men)才能任院士[10]。高等学院招揽了很多有活力的年轻挪威科学家，这在乌普萨拉是不可想像的。没有政府的考试和传统来规范专业的取向，这所新学校培养智性的自由，使新的科学专业和创新研究方法得以形成。可是在最初的数十年中，个人间的敌对和内部冲突是高等学院生活的一部分[11]。

在 19 和 20 世纪之交，瑞典的科学生活中有许多冲突。乌普萨拉和斯德哥尔摩的教授之间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并不一定产生摩擦。虽然今天的瑞典文化特性是不同团体中和平达成共识,不论这是否真实,在过去,学者间的敌意确实阻碍了集体行动。或大或小的分歧的断层线,布满了瑞典学术界的地表,不时产生些冲突的小震动,有时甚至一个大震灾。皇科院,更重要的是诺贝尔委员会，恰好处在这个复杂的个人和智性分歧的地震区中。

皇科院，更重要的是诺贝尔委员会，恰好处在这个复杂的个人和智性分歧的地震区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篇

每一次颁奖都会引起无休止的争端

1897—1914 年，
诺贝尔奖的开始

第一章　我所能想得出来的使用一份遗产的最愚蠢方式！

保持诺贝尔的理想

富可敌国的黄色炸药的发明人，艾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于 1896 年 12 月 10 日去世，留下了和他自己的隐秘生活一样难解的谜。自从他发明了硝酸甘油的安全使用方法，并以此建立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后，他就成为成长中的欧洲大众媒体的宠儿。然而他的孤独和沉默，却使与他同时代和想了解他的人感到困惑。他被形容为一位“含蓄、体贴的人，不喜欢一切形式的张扬”[1]。他从未好好享受他所追求的隐秘生活，也未能使他的财富带给他个人的满足。甚至在他去世之前，记者和其他的人便在猜测他的财富的归宿。1897 年初，一家瑞典报纸披露了诺贝尔遗嘱的内容。

1.1　诺贝尔的遗产

诺贝尔简短的遗嘱引起了大家的惊诧；没有人十分了解它的含义。随后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混乱和决心中，自私和无私的理想便决定了诺贝尔梦想的命运。围绕诺贝尔奖而产生的机构也带着这个难产的痕迹，它们未来的成形来自实际的操作，来自这个著名遗嘱本身。从一开始便有些怀有私心的人，想利用诺贝尔的遗产取得一己的利益，造成了口口声声的崇高理想和见不得人之私谋的争执。挽救诺贝尔遗志的努力颇具戏剧性，也为诺贝尔奖的历史掀开了序幕。

在混乱和决心中，自私和无私的理想便决定了诺贝尔梦想的命运。

遗嘱中有关的段落颇值一读；它是这段历史的开端，也是它最终的总结。

> 我余下的可变现的财产将依下述的方式处置：
>
> 本金由执行人作安全的投资，并设立一项基金。基金所产生的利息作为每年的奖金，颁给在前一年中对人类的福祉作出最大贡献者。利息将分成五等份：一份颁给在物理学上作出最重要的发现或发明者；一份颁给在化学上作出最重要的发现或改进者；一份颁给在生理学或医学上作出最重要的发现者；一份颁给在文学上创作了具有理想的最杰出作品者；一份颁给在国际和睦、裁减军备和促进和平上作出最大的努力或最佳工作者。
>
> 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由瑞典科学院授予；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医学院授予；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文学院授予；和平奖则由五位被挪威议会选出的人士决定。我恳切地希望在评审获奖人时不牵涉到任何国籍的考虑，而让最够格的候选人获奖，不管他是不是北欧人。

也许诺贝尔怀有些微的幽默感？这份遗嘱在法律上和解释上都有很大的问题。几乎每个句子都很含糊。即使能在法律上站得住脚，这个骨架如何能转化成一个可运行的实体呢？首先，所有这些被指定颁奖的机构都没有经过事前的质询。谁愿意背上这个重大的任务？第二，诺贝尔家族在瑞典、俄国和德国有许多有地位的人。他们对这个遗嘱和对他们很不利的安排都几乎不敢置信，因为留给他们的只是一点象征性的遗产。第三，到底哪一个国家在法律上对诺贝尔的遗嘱有管辖权也不是很清楚。诺贝尔虽然在瑞典出生，但自从孩童时代离开以后，他一直没有正式的瑞典公民身份。他大部分时间在巴黎，或意大利里维埃拉的圣雷莫(San Remo)，遥控着他的工业帝国。这份遗嘱于1895年11月在巴黎写就和签署,用的是瑞典文,证人也是瑞典人。有些法律体系可能因为它形式上的缺陷而不承认整个的遗嘱。也许最出人意料、最聪明的一着，是他的两位执行人的选择。而他也没预先与他们商量过。

也许最出人意料、最聪明的一着，是他的两位执行人的选择。

1.1.1 诺贝尔遗嘱的执行

将诺贝尔遗嘱付诸实行的责任，落在一位年青工程师索尔曼（Ragnar Sohlman）的身上。他从 1893 年起担任诺贝尔的私人助理。另一位执行人利耶奎斯特（Rudolf Lilljeqvist）也是一位工程师，他长索尔曼 15 岁，以前与诺贝尔没有私人关系。利耶奎斯特当时正在瑞典一个偏远的地区，修建一座诺贝尔支持的电化学工厂，所以主要的责任就由索尔曼一人挑了。索尔曼与诺贝尔共事多年，对诺贝尔忠心耿耿，但是他自认对他的雇主内心的情感毫不了解。然而他的忠诚、精力和智慧却起了主要的作用。

这两位执行人聘请林德哈根（Carl Lindhagen）为诺贝尔遗产的法律顾问。林德哈根刚开始自己很成功的政治和法律事业。他是一位心胸很开阔的人，是瑞典自由党较为激进的一位党员。他新当选为国会议员，并兼任一个区域上诉法院的助理法官。而他仍然能有时间担任执行人和法律顾问。与他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敏锐同样重要的，是他对斯德哥尔摩科学界的熟悉[2]。他的父亲帮助建立斯德哥尔摩高等学院；后来他接替了父亲，担任该校的行政秘书达 10 年之久。这种关系以后非常有用，因为执行人能否挽救诺贝尔的遗嘱，一部分要靠他们能不能以声望和研究经费来拉拢科学家。

靠耐心、坚忍和一点运气，这三个人于 1897 年开始面对法律上的挑战，和对遗产各种不同的诉求，为诺贝尔的遗嘱找出一条生路。在考虑如何执行诺贝尔的意愿之前，首先他们要让诺贝尔的遗嘱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化解家族成员在法律上的反击；说服有关的机构同意接受他们的任务。任何一步的差错，都可能意味着遗嘱的生存机会微渺。

任何一步的差错，都可能意味着遗嘱的生存机会微渺。

索尔曼很快在瑞典诉求诺贝尔遗嘱的法律认许。另外，不等外国法庭为家族方面提出干预，在瑞典法庭宣布遗嘱的合法性之前，他就开始抛售诺贝尔在国外的产业，将现金全部转回瑞典。他的这着预谋做得很成功。1897 年 5 月，瑞典司法部长宣布诺贝尔遗产纠纷的解决事关国家利益。虽然政府不直接介入谈判，但愿意为章程在法律上负责。而讨论的结果必须呈交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